

鳳凰網讀書
book.ifeng.com

郑重推荐

大学生 GE阅读

(第4辑)

王晓纯 吴晚云◆主编



General Education

爱因斯坦
论教育
顾彬

中国当代文学在欧洲的翻译与出版
王向远

日本文学民族特性论
史仲文

三位文化巨人的三式人格
熊培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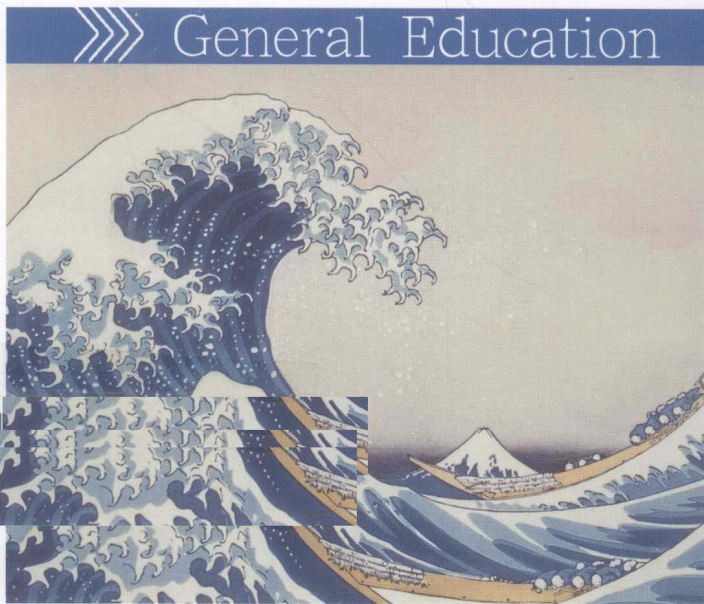
错过胡适一百年
庄永志

寄望央视新闻改革
梁文道

我的老校长高铭
李洁

老舍的变
柴静

老犹栽竹与人看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双月杂志
bimonth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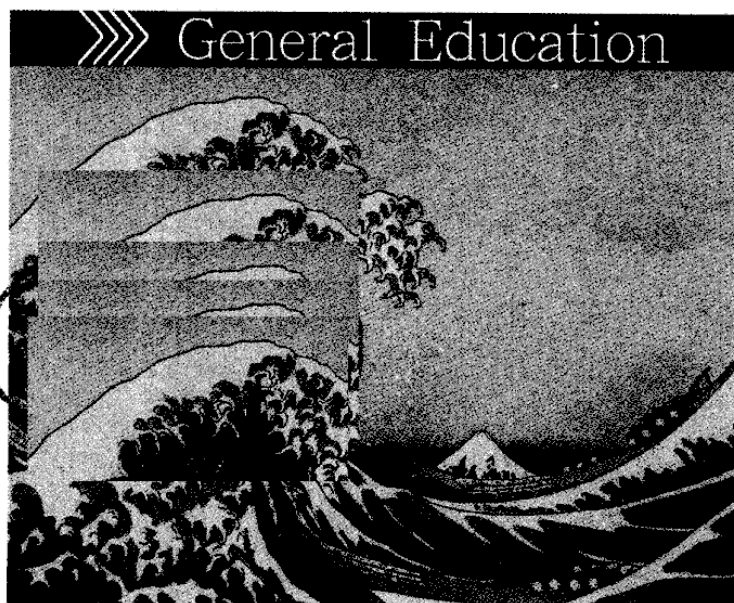
郑重推荐

大学生 GE阅读

(第4辑)

王晓纯 吴晚云◆主编

爱因斯坦
论教育
顾彬
中国当代文学在欧洲的翻译与出版
王向远
日本文学民族特性论
史仲文
三位文化巨人的三式人格
熊培云
错过胡适一百年
庄永志
寄望央视新闻改革
梁文道
我的老校长高锟
李洁非
老舍的变
柴静
老犹栽竹与人看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生 GE 阅读(第4辑)/王晓纯,吴晚云主编.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5
(通识教育丛书)

ISBN 978-7-81127-866-8

I. ①大… II. ①王… ②吴… III. ①社会科学-青年读物 IV. ①C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3180 号

大学生 GE 阅读(第4辑)

主 编 王晓纯 吴晚云

责任编辑 赵丽华 李艳华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责任印制 范明懿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 730×988 mm 1/16

印 张 21.75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7-866-8/C·866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大学讲堂

论教育	爱因斯坦(3)
中国当代文学在欧洲的翻译与出版	顾彬(7)
中国哲学的精神	单纯(16)
日本文学民族特性论	王向远(27)
中国古代语境中的革命、时间与礼法	柯小刚(39)

专题专论

三位文化巨人的三式人格	史仲文(45)
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	邵建(71)
错过胡适一百年(附:吃吃喝喝的民主)	熊培云(74)
中国古代和谐论之流变及应用	李珣平(85)
后汉灭亡的真正原因	史杰鹏(98)
触摸虚无主义的脉搏	王俊(103)
文化和原创文化	陈文庆(125)
可见与不可见:福柯的视觉思想探析	董树宝(135)
生态的秩序	
——由舍勒和莫尔特曼引发的生态思考	刘青汉(145)
中国古代怀古文学及其历史成因	王立(155)



2 目 录

横看成岭侧成峰

——苏轼与禅 张志军(166)

明清小说宝物描写与女性人物形象塑造 刘卫英(187)

秘密与信仰

——对“文革”文人告密“荒唐之恶”的反思 夏可君(192)

六个人生节点的阳光解读 福洛肯(199)

说说发财的事(上篇) 闻章(207)

论唐宋时期的救灾活民之术 李肖 方丽娜(219)

评书评人评事

寄望央视新闻改革 庄永志(229)

关于摩罗近来的变化 张文举(236)

我的老校长高锟 梁文道(240)

反思文化老人的卧底生涯 黑马(242)

老舍的变 李洁非(245)

“莎乐美”的魅力

——俞珊的故事 蔡登山(254)

做泥土,还是做尘土?

——忆韦素园 曹瑞涛(261)

地上的帕斯捷尔纳克 周冰心(265)

下乡记:茅屋读书(外两则) 尤泽勇(270)

老犹栽竹与人看 柴静(279)

“山寨版”的刍狗 赵玉琦(282)

中国式自由的演变

——《金瓶梅》与中国古代自由观 曾思艺(285)

绣帷之上的往事再现

——细读周邦彦《瑞龙吟·章台路》 赵晓辉(293)

对食指《疯狗》一诗的生存论解读 郭洪体(30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首诗的阅读史 冷霜(307)

“半空中开放的家”:女托邦,或爱的修辞学 王东东(311)

短语论文30则:中国传统经典散文的另类品题 街舞小男(321)



学者访谈

再现·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

——克莱尔·科尔布鲁克教授访谈录 金惠敏(325)

网络是我们时代的“唐诗”

——骆爽答《杂文选刊》记者问 骆爽(333)

读者回馈

阅读何为?

——读《大学生 GE 阅读》有感 王林生(339)

传统与现代的一种融合会通

——北方工大《大学生 GE 阅读》印象 姜娜(342)

大学讲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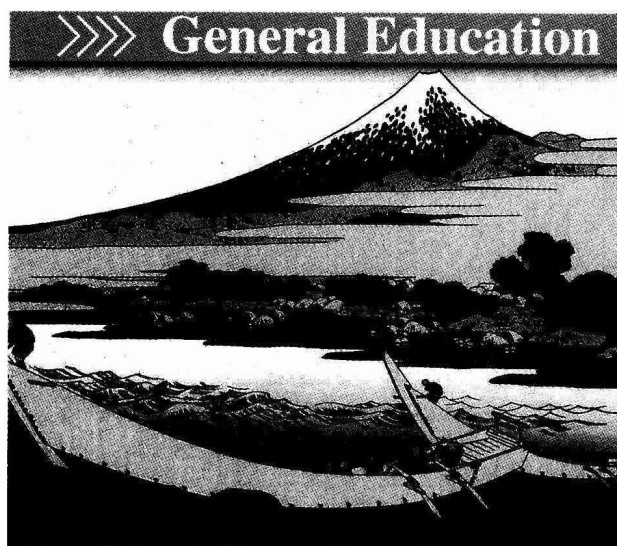
论教育

中国当代文学在欧洲的翻译与出版

中国哲学的精神

日本文学民族特性论

中国古代语境中的革命、时间与礼法





论教育^①

爱因斯坦

庆祝日的首要目的,通常是回顾往事,尤其是纪念那些由于对文化生活的发展而获得了特殊荣誉的人物。对我们前辈的这一友好的纪念活动确实不应该被忽视,特别是因为这种对往日盛事的回忆能够鼓舞今日善良的人们勇敢地奋斗。但是这件事必须由年轻时就与这个州^②紧密相连,并熟悉其过去的人来做,而不是由一个像吉普赛人一样四处流浪,在各种各样的国家积累经验的人来做。

因此,我只能谈论一些与空间和时间无关的,过去是,今后也将是与教育事务相联系的问题。在这一努力的过程中,我一点也不能以权威自居,特别是因为从古到今的明智的有才之士已经讨论过教育问题,并且已就这些问题反复明白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作为教育领域的半个门外汉^③,我阐述除个人经验和个人信念之外毫无根基的观点的勇气从何而来呢?如果这真是科学的问题,人们可能会对这些考虑保持缄默。

但是,对活跃的人们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此仅仅真理的知识就不够了。相反,若要知识不被抛弃,他就必须被不断地努力连续更新。它就像竖立在沙漠里的一座大理石雕像,虽是承受着被流沙掩埋的威胁,服务之手必须不断工作,以使大理石在阳光之下永远熠熠发光。我也要助一臂之力。

学校一直是把传统的财富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的最重要的手段。今天这种重要程度超过了以前,因为通过经济生活的现代发展,家庭作为传统和教育的载体地位已经削弱。因此,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健康比以前更加依赖于学校。

有时人们把学校看成仅仅是把尽可能多的知识传递给成长中的一代的工具。但这是不对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是在为活人服务。它应该在青年人身上培养那种

① 选自1936年10月15日为庆祝美国高等教育300华诞,在纽约奥尔巴尼市政府教育大厦校长厅举行的庆祝会暨纽约州立大学第72届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本文选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方在庆、韩文博、何维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此处指美国纽约州。——译者

③ 此处德文版为“绝非权威”(Keinerlei Autoritaet)。——译者



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个性,把个人仅仅作为如蜜蜂和蚂蚁那样的社会工具。因为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目标的标准化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毫无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学校的目标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而这些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目的。在我看来,英国的学校体制距实现这个理想最为接近。

但是人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理想呢?通过道德说教达到这一目标?绝对不是。言辞现在是,今后仍将是空洞的声音,通往毁灭之路从来都由关于理想的浮华之辞相伴。但是人格并不是由所听所说形成的,而是由劳动和行动形成的。

因而,最重要的教育手段是促使小学生们采取行动。这适用于小学生的第一次学写字,也适用于大学的博士论文,或者是写一首诗,作一支曲,口译或笔译一篇文章,解决一道数学题目,或是进行体育运动。

但是在每项成功背后都有一个作为其基础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反过来又被所从事的事业中取得的成功所强化和滋养。在这里存在着最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对学校的教育价值至关重要。同一工作,其起源可能归因于恐惧和强制、追求权势和声名的野心勃勃的欲望,或是对研究对象的爱好、兴趣以及对真理和理解的要求,因此也可以是每个健康的孩子都有的,但很早就被削弱了的神圣的好奇心。完成同样一件工作对小学生产生的教育方面的影响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这取决于他完成这件工作的内因究竟是害怕受伤害、利己主义的情感,还是获得喜悦和满足感。没有人会坚持认为学校的管理及教师的态度对塑造小学生的心理基础毫无影响。

我觉得最坏的莫过于学校主要用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的手段工作,这种做法摧毁了小学生健康的感情、真诚和自信,它产生出顺从的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学校在德国和俄国居统治地位。我知道这个国家^①的学校里不会产生这种最坏的邪恶——在瑞士,也许在所有民主统治的国家中都是如此。使学校脱离这种所有邪恶中最坏的邪恶,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给予教师尽可能少的使用强制措施权力,这样小学生对教师的尊敬的唯一来源就是后者的人性和理智品质。

所指出的第二个动机——雄心,说得委婉点就是以被承认和被尊敬为目标,牢固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没有这种精神刺激,人类合作就完全不可能;取得伙伴赞同的愿望肯定是社会最重要的约束力之一。在这个感情复合体中,建构性的和摧毁性的力量密切相连。取得赞同和被承认的愿望是健康的动机;但要被承认比伙伴或者同

① 这里指美国。——译者



学^①更优秀、更强大、更有才智,就很容易导致过分的自我为中心的心理态度^②,这可能对个人和社会都会造成伤害。所以学校和教师必须防止使用这种容易产生个人野心的简单方法,以敦促小学生们勤奋学习。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选择理论已经被许多人作为鼓励竞争精神的权威依据来引用,也有一些人用这种方法试图伪科学地证明个人之间毁灭性的经济竞争的必要性。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们进行生存竞争的力量,完全在于它是一个过着社会性生活的动物。正如蚁冢中单个蚂蚁之间的战争对于生存没有什么根本意义一样,人类社会中个体成员之间的斗争也是如此。

因此人们应该防止向青年人宣传把这种习惯意义上的成功当做生活的目标。这种意义上成功的人,通常从他的伙伴那儿得到很多,其所得通常远远超过他给他们的贡献。但是,人的价值应该体现于他能给予什么,而不是在于他能获得什么。

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最重要的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以及对该成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在年轻人的这些心理力量觉醒和强化之中,我看到了学校被赋予的最重要的任务。只有这样的洗礼基础才能导致一种快乐的愿望,去追求人类最高财富,即知识和艺术技艺。

这些创造性的心理力量的觉醒当然比强力的实行或个人野心的觉醒困难,但它更有价值。重点在于发展孩子对游戏的爱好及获得承认的愿望,并把孩子引导到对社会很重要的领域;这种教育主要建立在对成功活动被承认的愿望的基础上。如果学校成功地从这种观点出发进行工作,它将得到成长中的一代的高度尊重,学校给予的任务也将当做一种礼物来接受。我就认识一些喜欢在校时光甚于喜欢假期的孩子。

这样的学校要求教师在他的工作范围内成为一个艺术家。如何才能在学校获得这种精神呢?对此不可能存在万能补救方法。首先,教师们应该在这样的学校里成长。其次,教师在教学材料和教学方法的选择方面应该拥有广泛的自主权。因为他安排自己的工作的乐趣同样会被强力 and 外在压力所扼杀。

如果至此你们都专心地跟上了我的思考,你们可能会对一件事感到奇怪。根据我的观点,我已谈了这么多究竟以什么精神来指导青年。但是关于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我却什么都没有说。占主导地位的究竟应该是语言,还是科学中的技术教育?

对此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在我看来这些都处于第二重要的地位。如果一个年轻人已经通过体操和跑步运动训练了他的肌肉和身体耐力,今后他将适应任何体力工作。头脑训练及脑力和手工技巧的训练也是类似的。因此,当机智风趣的人将教育做如下

① 此处英文 fellow scholar,而德文为 Mitschuler,译为“同学”更恰当。——译者

② 此处德文为 Einstellung。——译者



定义时,他大致是不错的:“如果人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的一切,那么所留下的就是教育。”正因为此,我一点也不急于在古典的语言——历史教育和更偏重自然科学教育的两种方法的追随者们之间的斗争中表态。

另一方面,我想反对另一观念,即学校应该教那些今后生活中将直接用到的特定知识和技能。生活中的要求太多样化了,这使得在学校里进行这种专门训练毫无可能。除此之外,我更认为应该反对把个人像无生命的工具一样对待。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于那些培养将来从事较确定的职业人才的技术学校也适用。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远应该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能力的培养,而不是获取特定的知识。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并学会了如何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肯定会找到属于他的道路。除此之外,与那些接受训练主要以获取细节知识的人相比,他更加能够使自己适应进步和变化。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在此以一种多少有点较为绝对的形式所谈的内容,代表的只不过是我的个人观点,其基础仅仅是自己作为学生和教师积累的个人经验。

(演讲者系 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中国当代文学在欧洲的翻译与出版^①

顾彬

很高兴能结识这儿的老师和同学,我希望能在此作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首先感谢贵校给我精心安排了这样好的机会,使我能把自己的一些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3月份,我有机会去美国参加一个翻译会议,在那里用英文做了一个报告。今天,我想再用中文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存在不少问题,但一般来说,不搞翻译的人是无法了解这些问题的。我承认自己是一个追求经典的人,就是说,我对语言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不仅如此,我对文学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我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翻译家和作家。我创作诗歌、散文和小说,在包括德国在内的德语国家出版了八部文学作品。大家总认为我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专家,其实也不尽然。在德国波恩大学,我基本上没有机会给那里的学生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在那儿,我主要谈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代历史。在20多岁的时候,我迷上了中国诗歌,尤其是唐诗,其次是宋代散文,所以我还从事中国中古时期的文学研究。另外,我刚刚在德国出版了《中国古代戏曲史》。过去三年来,我基本上没有太多地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当然,这其中并不包括诗歌,因为我始终对中国当代诗歌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今天,我在这里所讲的纯属个人的见解,如果大家觉得有不对的地方,那么欢迎随时更正和补充。我希望能形成一种争论的氛围,不太乐意别人一味地附和我的观点。接下来,我想从三方面展开话题:首先谈一谈人们对汉语的一些误解,然后介绍一下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出版和翻译情况,最后讲一下语言的重要性。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便开始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可是,我公开承认自己是翻译家的时间却很短。原因有这样几点:第一,德国大学很晚才对教授从事翻译工作予以认可。在今天,你们会发现德国大学基本上没有几位教授做翻

^① 本文系顾彬先生2009年9月10日在北方工业大学人文素质大讲堂演讲稿。



译,原因很简单——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另外,我对自己的翻译工作有种“怨恨”的情绪。不只是因为翻译的地位比较受人轻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总是占用我自己的宝贵时间。比方说,我每天早上五点半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那么,这样的工作能够持续多久呢?半个小时!最多三刻钟!为什么这样短?这与我的翻译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我得翻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每天大约要花三四个小时。这样一来,我的大部分时间不是留给自己,而是留给了中国的当代作家。可一般来说,中国的作家们并不了解我这样的状况,反而认为我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另外,要想成为一名好的翻译,必须具有相当高的语言水准。我能够创造自己的词汇。有时,在没有其他出人的情况下,我会用这些创造的词汇翻译中国的诗歌。可是,一旦我在翻译中用了这样的词汇,那么就不能再次使用了,不然人家会以为我是在抄袭欧阳江河(1956 -)和王家新(1957 -)的诗歌。

过去 20 多年里,在众多德国机构的邀请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来到德国,与当地的读者见面。不少著名的作家,比如王蒙、张洁等人,还能在德国呆上一年半载。有时,德国机构会给语言水准一般的作家召开翻译会,请我帮忙把他们的作品译成优美的德文。但是,如果他们的语言本身有问题的话,我能顺水推舟地译成差的德文吗?当然不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作家的德文版作品有时要好于中文原作。我听说,美国人对翻译工作是不重视的。如果要申请大学职位,最好不要告诉委员会曾从事过翻译,不然很有可能失掉工作的机会。

通常来说,一名翻译者仅凭一本辞典就可以开始他的工作。除此之外,他可以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甚至包括相关的知识。但是,一位作家的思想总是会有其来源的。比如北岛(1949 -),他的诗歌与 30 年代的朦胧诗派有着密切的关系。直到现在,他还在重申自己受到了老一辈诗人的影响。那么,若是想成功地翻译北岛的作品,怎可以不事先了解一下 30 年代朦胧诗的发展呢?再如杨炼(1955 -),他受到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 - 1976)的影响。在他的诗歌中,经常出现海德格尔的“挖掘”(Ausgraben)的概念。可是,如果对海德格尔缺乏了解的话,你能读懂杨炼吗?总之,一名优秀的翻译者应具备渊博的知识,同时还要通晓多种语言。在欧美汉学界,很少有人读过我本人的作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一直忙于中国当代诗歌的译介,而这的确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在翻译的时候,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因而必须为此跟周围人交流一下,不然就没法继续进行。至今我还记得上个世纪 90 年代与德国的同仁们交流杨炼诗歌的情景。另外,我对自己的翻译工作也始终存在着质疑。不过,幸运的是,我现在得到了德国翻译界和德国作家的认可。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我的译作,从而使得我的翻译水平一直在不断地提高,同时也令我觉得自己非常适合从事这项事业。去年,德国最大的出版社要求我再出一本译作,因为原先的两本诗集



已经卖光了。本来我想把给杨炼的译作再版一下,但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问题,于是便重新译了一遍。讲这些无非是想表明,我对自己的翻译始终没有感到满意的时候。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承认自己是一位翻译家的呢?很晚。1985年,波恩大学聘请我教授汉语。这所大学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专业,注重把年轻人培养成未来的翻译家。因此,从1985年起,我开始在波恩大学逐步开展翻译工作,后来,由于这一工作得到了德国作家和翻译家的认可,我也就渐渐公开了自己的翻译身份。现在我非常迷恋这项工作,原因很简单——这对提高德文水平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要知道,德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语言系统,不少教授之所以无法在德国立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德文不够好。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借着翻译的机会,我开始努力提高自己的德文。

现在,我想谈谈第一个话题——对汉语的误解。最近,我读到这样一篇文章。德国翻译家彼得·乌尔班(Peter Urban, 1941-)说,他在译介俄国作家契诃夫(Anton Chekhov, 1860-1904)作品的时候,所用的词汇都不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这位俄国作家。但这怎么可能呢?难道契诃夫懂德文吗?我想,乌尔班的本意大概是想表达对原作的忠诚。但是,对一位优秀的翻译家来说,他应该有自己的创造。如果读一下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1939-)的作品,你会发现,他完全是从创造的角度开展翻译工作的。可以说,他创造性地译介了中国当代的作品,尽管他也许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就像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的那句著名的口号——**Make it new!** 葛浩文认为,《狼图腾》有不少地方是有问题的。比如里面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作为犹太人,他当然不可能把具有这种倾向的内容译成英文,而且他也明白,这样的作品是不会有在美国出版的。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这部作品有三分之一的内容被删除了。另外,葛浩文本人也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作家,在翻译中国当代小说的时候,对于那些水平较差的作品,他采用了概括和总结的译介方式。因此,他在美国出版的那些译著,其实融合了他本人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理解和判断。我的一位学生,现在是我的助手,他把《狼图腾》全部译成了德文,但在出版的时候却遇到了困难。原因就是德国人对其中的一些内容非常敏感,尤其是像“血”和“土地”(Blut und Boden)之类的字眼,因为这都是希特勒当年曾使用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找到编辑部,以英文版本为依据编译德文版本。于是,同样在取消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之后,才得以在德国出版这部著作。美国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最有名的小说就是以狼为主题的。姜戎(1946-)在上个世纪60年代读过杰克·伦敦的作品,可以说,他的《狼图腾》是中国式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德国人看过杰克·伦敦的作品,所以他们对姜戎的话题并不陌生。德国人有个习惯——喜欢过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回味一下孩提时代读过的东西,由于许多人过去看过杰克·伦敦的作品,所以



他们很想知道中国人是怎样写的。

大家都知道莫言(1956-),他一般会在两三个月之内完成一部小说。比如《生死疲劳》,他说自己是在43天内创作完成的。德文版的《生死疲劳》一共990页。可是,一位德国作家能在三个月之内写出900多页的文字吗?如果是一位通俗作家的话,那么是有可能的。但如果他是一位严肃作家,则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在奥地利发表的小说,总共约100页,为此,从2003年到2006年,我忙了整整三年,然后又花了三年时间修改,就是说,从2006年一直忙到现在,然后才出版。原因在于,我需要反复地检查其中是否存在问题。并且,如果一部小说问题太多的话,会给翻译者带来很多的困难。要是出版社的编辑发现存在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他怪罪的将是翻译,而不是作者。因为在他看来,作品的一切错误似乎都应归咎于翻译者。

现在谈一下第二个问题——译本的问题。我们原本认为,一位作家在完成创作之后,将作品交给出版社就大功告成了。不管他写的是什么,出版社肯定会按照本来的面貌出版,可实际上这样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好的出版社是不会这样做的。直到现在,德国还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传统,这就是,每逢书籍出版的时候,出版社会组织人逐字审查。一旦发现问题,便会邀请作家和翻译家共同商议该如何修改。这说明作家、翻译家和出版社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作关系。另外,就目前看来,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版成为与市场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今天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刊登了一篇有趣的文章,一位英国人在提到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发行的时候,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其实就在于包装,精美的包装将有助于中国当代文学开拓市场,这样一来,作品封面的设计便成了关键问题。比如姜戎就认为,他的作品封面上应该有狼的图片,不然会影响书的销售。难道作家是有意要这样做的吗?不是的。但为了能顺利出版,作家将不得不听从出版社的建议。

另外,外国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的确依赖于翻译的水准。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原作,翻译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翻译水平不高的话,将会给作品的销售带来很多的困难。葛浩文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让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结果他成功了,因为他的英文很漂亮,并且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他的英文译作水准要比原作高出许多。正因如此,他现在成了德国出版界争抢的热门人物。当葛浩文在美国出版了某部中国当代小说之后,马上便会有德国出版社提出购买作品的版权,然后再请某位精通英文的翻译家将英文本转译成德文本。通常来说,葛浩文不做诗歌、散文和戏剧翻译。想出版哪位作家的哪部作品,完全取决于出版社的要求。

当然,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德国,出版社都想卖出自己的书,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对此,我不会提出批评。但是,在销售姜戎、余华和莫言等人的作品的时候,出版社会在海报上作这样的宣传:某本书的销量超过了《圣经》!某本书成为了世界上最



畅销的书籍！……那么在德国，都是哪些人阅读中国当代小说呢？文学家？教授？都不是！在德国人眼里，中国当代小说大多属于通俗文学，它的读者基本是些对文学没有过高要求的人。但是，对德国读者来说，如何才能找到一本令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呢？德国出版社自会有一套办法吸引众人的眼球，令人感到——这正是我想要的书！

在德国，人们通常把非常厚的书称做“火腿”。为什么呢？以前，我们的祖先靠一根火腿就能度过冬天。天天吃火腿，多好！同样，人们不一定非得天天读不同的书籍。如果一本书能读上一两个月，也是件很不错的的事情，这样的书被称做“火腿”。不过，一般来说，火腿之类的书多是留给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看的。开始的时候，中国作家在德国是比较成功的，为什么呢？要知道，德国出版的书有 70% 属于译本。这说明，德国读者根本不喜欢读德国作家的作品！原因在于，许多有代表性的德国作家不会讲故事，而是更倾向于思考社会问题。相比之下，美国和中国的作家则很会讲故事。比如莫言，在他的故事中会出现上百个人。可如果听不到故事的话，人们就无法了解生活和生命的意义所在。不过，中国当代作家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常常改写一些已经写过的故事。

现在谈一下语言的问题。是的，语言是一门艺术和一种手段。翻译家可以对作家的文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作家往往对翻译家有着较强的依赖心理。但翻译家并非就是完全独立的，因为他还得服从出版社的安排。有一家很小的出版社，总共才两三个人，然而生意却非常兴隆，因为他们总有办法把书推销出去。有一次，我在此出版一本翟永明（1955 - ）的诗集。因为翟永明的作品没有标点，这样一来，出版社的老板不愿意了：这怎么行！于是他就把标点都添上了。那么，翟永明的德文译作还能跟中文原作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了！不过，我后来也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因为经常要在德国开朗诵会，如果没有标点的话，我会感到读起来比较吃力，甚至有时会读不下去。可是要知道，参加朗诵会的听众都是买了门票的，所以他们的要求自然会比较高。如果我出现问题的话，他们会抱怨，说枉掏了钱。因此，考虑到这样的原因，我现在开朗诵会的时候也习惯加标点了。

由于姜戎不会英语，所以他在英国的知名度不高。包括莫言、余华（1960 - ）等人，他们的外语水平都不太好。另外，在美国出版的书有 95% 是用英文创作的，这说明，美国人根本不读非英语类的书籍，包括德文著作。如果把美国看成是西方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根本不属于西方国家之列。在德国，最成功的当属中国当代诗人。但在美国，由于精通英文的葛浩文的大力推介，中国当代小说家显得格外出众，而杨炼、王家新等诗人则显得默默无闻。当然，这其中并不包括北岛。他在英语国家已呆了 30 多年，但英语也不是很好，可为什么他会成功呢？因为他的翻译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美国作家，并且 40 年前还学过一点中文。尽管中文几乎全忘光了，但他有自己